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192-200.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2>



生态话语与经济模式：

《红色之心》对《黑暗的心》的后殖民生态重构

熊鸿妍(Xiong Hongyan)，邹 涛(Zou Tao)

摘要：贾克斯·穆达的《红色之心》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文学的扛鼎之作，通过与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深刻对话，对后殖民国家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严峻拷问。小说将背景置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刻画了南非原住民科萨族在面对外部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方案时产生的深刻分裂，揭示了依附型发展模式对本土社会、文化及生态的系统性破坏。本文以后殖民生态批评为框架，并借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转嫁”及“二元结构”等概念，论证《红色之心》中的生态世界观对经济模式选择的关键作用，指出穆达通过重构本土生态智慧，为后殖民南非探索出一条实现经济“自力更生”的可行蓝图，彰显其文学构想作为社会变革方案的深刻现实意义。

关键词：贾克斯·穆达；《红色之心》；后殖民生态批评；重构

作者简介：熊鸿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洲文学。电邮：willow94664@163.com。邹 涛（通讯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非洲文学，比较文学，英美文学。电邮：truthzou@126.com。

Title: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Economic Models: The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art of Redness* in Relation to *Heart of Darkness*

Abstract: Zakes Mda's *The Heart of Redness* is a landmark of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that challenge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vailable to postcolonial nations through a sustained dialogue with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The novel dramatizes the profound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a Xhosa community as it confronts modernization schemes

driven by external capital—a conflict rooted in the dual pressures of colonial legacies and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framework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s like “cost externalization” to argue that the novel’s ecological worldview is pivotal to shaping competing economic models. By reconstructing Indigenous ecological wisdom, Mda ultimately envisions a path toward self-relia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ovel thus transcends literary imagination, offering a powerful political critique of externally imposed economic systems.

Keywords: Zakes Mda; The Heart of Redness;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Reconstruction

Author Biography: Xiong Hongyan,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Research Area: African Literature. E-mail: willow94664@163.com. Zou T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Research Areas: Af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truthzou@126.com.

南非著名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贾克斯·穆达（Zakes Mda, 1948—）的《红色之心》（The Heart of Redness, 2000）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文学的一部扛鼎之作。作为当代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小说自出版后便备受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举斩获非洲地区英联邦作家奖、美国赫斯顿与赖特遗产奖及南非首届周日时报小说奖等多项殊荣。

小说深刻地回应了南非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穆达将故事背景置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以两条叙事线索交叉进行：一条回溯至 19 世纪中叶，荷、英殖民者入侵南非，当地科萨族（Xhosa）因对先知的反殖民预言态度分裂为“信者”（the Believers）与“不信者”（the Unbelievers）两大群体，最终导致了历史性的悲剧；另一条则聚焦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两个群体的后裔在面对外部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开发方案时再生分歧。两条线索相互映照，将两大群体之争刻画为一场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关于西方与非西方、进步与传统、文明与野蛮的深刻辩论。历史上殖民主义对南非原住民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在全球化语境下，“新南非”所面临的发展窘境其症结又是什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已从多维角度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国内学者如钟燕（2014）从生态批评视角指出了小说“自然与文化结盟”的核心出路；段燕、王爱菊（2017）则系统论述了殖民主义如何导致南非在社会、精神与自然三个层面的生态崩溃。国外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部分学者从后殖民历史与文化身份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小说如何处理历史创伤与文化记忆（Koyana, 2003; Kenqu, 2019）；另一部分学者则聚焦于小说的生态批评意涵，探讨了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可能（Vital, 2005; Dolce, 2016）；此外，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小说中对全球化旅游业的批判及其剥削本质（Pires, 2013; Ojedoja & Abubakar, 2018）。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小说的生态意旨和后殖民批判锋芒，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色之心》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的对话，是一次深刻的系统性重构（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穆达精准地捕捉并接过了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无意识揭示的“生态观塑造经济

论”这一结构，但用一种充满主体性的非洲本土生态观，替换了康拉德笔下那个沉默、野蛮的“他者化”（Othering）自然，并由此推导出一个与殖民掠夺截然对立的、内生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模式。所以，文学中的生态话语并非孤立的审美实践，而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深刻地塑造并反作用于其内含的经济模式，为该经济模式提供了合法性框架与文化支撑。

具体论述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聚焦《黑暗的心》，分析其殖民生态话语如何为掠夺式经济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然后，转向《红色之心》，探讨穆达如何通过重构非洲自然的主体性，为文化去殖民化奠定世界观基础；最后，论证穆达笔下两种经济模式的对决背后不同的生态世界观，并结合作者本人的社会实践，揭示其文学构想作为一份旨在探索后殖民南非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社会变革蓝图的深刻意义。

一、黑暗的土地：康拉德笔下的殖民生态话语与掠夺式经济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以马洛的视角展开，详细展现了他沿刚果河深入非洲腹地的旅程。文本叙述多集中于马洛对沿途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描绘，而对自然景观的关注相对较少。例如，达拉斯在《康拉德与西方：帝国的征兆》中便指出，非洲风景早已被殖民话语塑造，马洛所见实际上是一种被文化规训的“景观”（Darras, 1982, p. 90）。他所描绘的非洲人，往往被呈现为狂乱与野蛮的化身：“一阵混乱的哭喊声，夹杂着野人的不谐调的吼叫，震荡着我们的耳鼓”（康拉德，2016, p.73）；同时，马洛也讽刺了以枪炮和铁路为标志的欧洲工业文明对非洲风景的掠夺与破坏：“紧接着一声沉重的爆炸声，震动了脚下的大地，一阵白烟从峭壁上升起，然后就算完事了”（康拉德，2016, p.35）。阿契贝在其著名文章《非洲的一种形象》中也着重分析了马洛的行程，但他将重点放在对非洲人的描绘，并据此认为康拉德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Achebe, 1977, p.788）。

然而，作为叙事背景长期存在的自然景观并非中立，而是同样被卷入殖民话语的建构之中。马洛眼中的非洲河流与丛林被不断妖魔化、沉默化，成为一种无主的、等待开采的“空白之地”。这种“自然的他者化”，在无形之中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文化合法性：正因为非洲被呈现为荒蛮而无声的空间，殖民经济的暴力开采才显得顺理成章。换言之，《黑暗的心》中的自然书写不仅仅服务于营造氛围或象征人心黑暗，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象牙贸易等殖民经济活动提供了话语支持。

殖民话语在《黑暗的心》中通过叙述与修辞系统性地“空无化”自然，使非洲被想象为一个等待被定义与占有的空间。小说开篇，马洛回忆童年对地图的迷恋：那时的非洲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神秘的空白点”，可以“让孩子做各种美梦”（康拉德，2016, p. 23）。然而，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这个“空白点”逐渐被地名和符号填满，不再神秘，反而“变成一个黑暗地区”（康拉德，2016, p. 23）。正如乔修峰指出的，地图并非中性的记录工具，而是通过符号化的空间秩序来建构殖民权力（乔修峰，2024, p. 108）。当马洛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的航行被描绘为进入一片“沉默”的过程：森林的“深沉的寂静”，河流“一声不响地向前流动”（康拉德，2016, p. 88），使自然被剥夺了生命和能动性。

沿河而上的航程简直有点儿像重新回到了最古老的原始世界，那时大地上到处是无边无际的植物，巨大的树木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一条空荡荡的河流，一种无边无际的沉默，一片无法穿越的森林。（康拉德，2016, p.64）

叙述将非洲自然推回到“最古老的原始世界”，仿佛它停滞在历史的起点，暗示这片土地缺乏发展的时间性，从而被置于欧洲现代性之外。其次，“巨大的树木”被比喻为“帝王”，而河流则是“空荡荡的”，森林“无法穿越”，这种对比制造了一种张力：自然被赋予威严的支配力量，却又因其“沉默”与“空无”而被排除在人类文明与对话之外。换言之，文本通过强调其不可接近与不可理解，将自然建构为“无主之地”。正如后殖民生态批评家哈根与蒂芬所言，殖民主义往往依赖于把土地描述为“空无”（empty）或“未开化”（untamed），以使其征服与开发显得“必要”与“合法”（Huggan & Tiffin, 2010, p. 6）。

当自然失去了主体性和神圣性，它就不再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而仅仅是可供量化与攫取的物质集合。在叙事中，象牙显然是最具驱动性的核心商品。马洛的航船运载着“破烂的棉花、念珠、铜丝”（康拉德，2016，p. 49），这些廉价的工业品被送入“黑暗深处”，换回的却是“珍贵的象牙”。在这场极不平等的交易中，非洲的自然与文化被置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而象牙——从大象这种富有灵性的生命体上暴力剥离下来的部分——则被抽象为纯粹的、价值高昂的商品。大象的生命、其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其在本土文化中的神圣意义，都在“象牙”这个经济符号面前被完全抹去。这种话语切割与价值重估，构成了掠夺性经济得以被感知与接受的前提。“库尔茨的荒诞绝非单纯的逐利本能……他掌控大量‘象牙’的权力让他自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这种优越感最终将他推向疯癫”（Zannat & Zhang, 2021, p. 504）。库尔茨的堕落，固然有人性层面的原因，但其经济活动的本质——最大化地榨取象牙——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自然本无价值，除非它能变成商品”的生态观念之上。

因此，康拉德的生态书写与殖民经济并非两条平行的线索，而是互为因果。正是因为他笔下的非洲自然是一个沉默、野蛮、无主的“客体”，所以殖民者对其进行的经济掠夺才显得顺理成章，这些行为在叙述反讽中被粉饰为一种“崇高和公正的伟大事业”（康拉德，2016，p. 45）。这片土地不被视为家园（homeland），而被视为资源产地（resource frontier）。这套合法化链条将成为穆达在《红色之心》中加以解构并重建的关键对象。

二、言说的土地：穆达对非洲自然主体性的重构

如果说康拉德是通过剥夺自然的“语言”来为其资源化铺路，那么穆达的帝国反写，则是对自然主体性的重构，让自然为自己言说。在《红色之心》中，穆达的核心策略是重新赋予非洲自然以“主体性”（Subjectivity），让土地、河流、树木、动物不再是沉默的背景，而是成为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文化的承载者和精神的对话者。这场生态观念的革命，为构建一种全新的、后殖民的生存模式奠定了世界观基础。

穆达的主体性重构首先通过对“地点之灵”（Genus Loci，即地方的精神特质）的重塑展开，尤其体现在对河流的描绘上。《红色之心》所描绘的1856–1857年科萨族“杀牛运动”，是殖民秩序与本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殖民者从欧洲运来的牛群携带严重的肺病，迅速传染并导致当地牲畜大规模死亡，这对以牧畜为生的科萨社会构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此背景下，少女先知农卡乌斯（Nongqawuse）发出了极具震撼力的神谕：人们必须杀死所有牛羊、毁坏庄稼，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从河海复活，新的民族将随之降临（Mda, 2002, p. 79）。正是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河流被赋予了

决定性的神圣性，它既是祖先归来的门户，也是预言得以显现的媒介。在杀牛运动遭遇挫折后，国王萨黑里(King Sarhili)并未放弃，而是“再次从他的大本营骑马来到科洛拉”，并最终在凯河的入海口，看见了“二十一年前被英国人斩首的父亲”(Mda, 2002, p.124)。这条河超越了纯粹的物理空间，升华为一个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实与历史的神圣媒介与象征场域。被殖民者斩首的国王，其身体的残缺象征着民族的创伤，而他的“复现”则必须借助本土的自然媒介。更重要的是，祖先的亡魂通过河流发出了明确的政治指令：“他们是来解放黑人国度的”(Mda, 2002, p.124)。在此，河流成为了反殖民意志的宣讲台，它不再沉默，而是主动“言说”，将一段被压抑的历史创伤转化为未来行动的神圣启示。穆达通过这种“再赋魅”(re-enchantment)的书写，将土地从殖民者绘制的、可被测绘和占有的世俗地图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神圣性。

其次，穆达通过微观叙事，深入描绘了一个基于万物有灵论的、非功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小说对长老齐姆(Zim)与其屋前那棵巨大无花果树的关系的描写，便是一个极佳的范例。这棵树在穆达笔下，远不止是一株植物，它是一个集历史见证者、精神庇护所和文化共同体于一身的、充满能动性的生命体。穆达赋予了这棵树言说与记忆的能力：“无花果树知道他所有的秘密。它是他的忏悔室。在树下他找到了慰藉，因为它与祖先直接相连——所有一百多年前种植它的Twin的后代。现在它的树干和他的主屋一样粗。”(Mda, 2002, p.38)在这里，“知道”(knows)一词是关键，它将树从一个被观察的“客体”(object)提升为一个有认知能力的“主体”(subject)。与康拉德笔下那个“沉默”的、拒绝与人沟通的丛林相反，这棵树能够“倾听”并“保守”秘密，成为了齐姆情感与精神的承载者。在科萨人的宇宙观中，自然并非与精神世界相割裂，而是后者的物质载体。这种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信仰体系，不同于西方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是典型的本土生态智慧。

这种主体性进一步延伸至树上的生物。树上栖居着成百上千的鸟，像一座繁荣的“城市”，这个比喻本身就将生态系统描绘成一个有序的社会，而非殖民者眼中的混乱“荒野”。当一个鸟巢不幸坠落时，齐姆感到“非常痛苦”，因为“鸟儿多日的劳作白费了”(Mda, 2002, p.39)。他所共情的，并非潜在食物的损失，而是对另一个物种“劳动”价值的承认与尊重。这与旁观者功利主义的视角——认为齐姆守着这么多肉却不吃是“愚蠢的”(foolish)——形成了鲜明对照(Mda, 2002, p.39)。这种冲突深刻揭示了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一种是殖民主义式的、将非人生命“资源化”的工具理性；另一种则是本土的、承认万物皆有其内在价值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关怀。正是后一种世界观，为卡玛古后来提出的、依赖本土物种多样性而非单一资源开发的合作社经济，提供了伦理基础。

殖民主义的重要一环便是通过语言（特别是命名法）来控制对世界的认知，将本土的地名、物种纳入西方的分类学体系，从而抹去其本土文化内涵。穆达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大量嵌入未经翻译的科萨语词汇来命名当地的动植物、食物和文化活动，如 amahobohobo（黄色织巢鸟）、umphokoqo（玉米粥）、isikhakha（卡卡裙）、imbhizo（公共会议）等。这并非简单的异国情调展示，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抗争。穆达坚持使用本土语言命名，正是从殖民者的命名体系中夺回对自己土地的定义权，坚持了本土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当一片土地上的万物都用它们自己的名字被称呼时，这片土地便在文化上宣告了独立。这种语言上的去殖民化，是构建本土自主经济模式的先声，因为它首先确立了“本土”的价值不言自明，无需外来语言的翻译与认可。

综上所述，穆达通过重塑地点之灵、彰显本土生态智慧和坚持语言主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与

康拉德截然相反的生态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不再是沉默、被动、等待被利用的“客体”，而是充满生命、历史与智慧的“主体”。这一根本性的世界观变革，不仅是对殖民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更为关键的是，它彻底摧毁了殖民掠夺式经济赖以存续的思想地基，并为一种全新的、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模式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从“依附”到“自力更生”的经济实践

在完成了对生态世界观的重构之后，穆达将小说的矛盾焦点最终引向了后殖民南非最核心的现实议题：发展。本章旨在论证，小说中两种经济模式的对垒，其本质是后殖民社会中两种根本对立发展哲学的深刻较量：一种是延续殖民逻辑的“依附”（Dependency）模式，另一种则是寻求真正自主的“自力更生”（Self-Reliance）模式。穆达通过对前者的深刻批判，以及对后者“生态实践”的积极探索，不仅为小说中的科洛拉社区，更为现实中的后殖民民族指明了一条通往真正解放的道路。

（一）“依附”的魅影：作为生态殖民主义变体的外部发展模式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最早由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中叶提出，旨在揭示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如何在经济上通过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外部资本渗透和技术垄断等方式，继续处于对发达国家“中心”的依附地位，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小说中，“赌场度假村”和道尔顿的“文化村”方案，正是这种依附模式在资本和文化领域的文学再现。

“赌场计划”是资本依附的直接体现。该计划由一个黑人赋权公司（black empowerment company）的首席执行官 Lefa Leballo 和两位前白人高管 Smith、Jones 共同推动，这一人员构成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象征着新南非精英与旧有资本的合谋。该计划的诱惑力在于其宏大的现代性承诺：“过山车”、“缆车”、“购物中心”、“网球场”和“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Mda, 2002, p.189）。值得注意的是，反对传统的声音也在其中找到了“合法性”。在科萨文化中，赭石红（redness）自古以来是生活的重要符号。它既用于身体绘饰和仪式活动，也象征着祖先的庇佑与共同体的凝聚力。然而，伴随着殖民文化的渗透，这一象征逐渐被污名化，甚至与“落后”和“野蛮”相连。康拉德笔下的非洲“黑暗”，原本是殖民者建构出的负面意象，如今却被部分“开化”的本土精英内化，转而投射到自己的文化符号之上。支持赌场计划的长老博科（Bhonco）便将赭石文化贬斥为“红色的黑暗”（darkness of redness），声称它让人陷于荒蛮而无法进入现代文明（Mda, 2002, p.218）。这种表述正是殖民话语渗透的明证：在外部资本的光环之下，本土文化被重新定义为阻碍进步的障碍。

然而，这一计划的依附性本质在公共会议（imbhizo）上被卡玛古彻底揭露。首先，它以破坏本土生态为前提，开发者承认将“砍掉所有这些树……铲除大量本地灌木并种植一个漂亮的英式花园”（Mda, 2002, p.189）。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殖民主义”（Eco-colonialism），即以牺牲本土生态来满足外部资本的开发需求。其次，其发展成果无法由社区共享。卡玛古一针见血地指出，赌场不仅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带走村里仅有的一点钱”，让本地人陷入更深的贫困（Mda, 2002, p.111）。最终，该计划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外部资本和腐败的酋长手中，后者用“一瓶白兰地”或“手机和卫星电视接收器”就出卖了土地（Mda, 2002, p.167）。整个社区在此过程中沦为被动的、被规划的对象，其命运依然依附于外部力量的“恩赐”或剥削。

如果说赌场计划是资本依附，那么道尔顿的“文化村”则是文化依附的变体。它试图将本土文

化打包成一种可供外部（西方）游客消费的“奇观”（spectacle）。在与卡玛古的辩论中，道尔顿的逻辑是纯粹市场导向的：“这是一种被证明可行的生意。游客喜欢参观这样的文化村庄，看看人们是如何生活的”（Mda, 2002, p.223）。为了迎合这种外部想象，他主张展示一个被刻意策划的、拼凑的、甚至虚假的过去。这种做法的危害在于，它剥夺了本土文化自我定义、动态发展的权利，将其本质化与商品化，最终变成了满足外部凝视、可供消费的“博物馆展品”（museum piece）。文化的价值不再由自身传统和当代实践来定义，而是由外部市场的凝视和消费意愿来定义。这正是文化上的“依附”，其后果是“挖掘出一个被埋葬的前殖民身份……暗示他们目前没有文化……生活在文化真空中”（Mda, 2002, p.231）。

因此，无论是赌场还是文化村，穆达都将其诊断为失败的方案，因为它们非但不能带来自主，反而会加深在资本和文化上对外部世界的依附，从根本上违背了去殖民化的目标。

（二）“自力更生”的出路：作为生态实践的本土经济模式

与依附模式相对，穆达借由卡玛古所构建的，是一种作为“实践”的自力更生模式。它将第二章所建立的生态世界观，转化为具体的、服务于社区的社会经济行动，呼应了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等非洲思想家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发展哲学。

因此，这一实践的起点颇具象征意义：它源于卡玛古向库可兹娃学习如何捕捞海洋。当他想自己动手时，“女人们不会教他。他作为一个顾客是好的，而不是一个竞争者”（Mda, 2002, p.129）。直到库可兹娃这位本土生态智慧的化身，亲自教他如何辨识潮汐、如何使用工具，他才得以入门。这一情节隐喻了真正的自主发展，必须始于对本土知识的谦逊学习，而非外部技术的强行植入。

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的成立体现了“自力更生”的核心原则。首先是资源内生。合作社的业务是“捕捞海洋的产物并制作科萨服饰和珠宝”（Mda, 2002, p.231），其原材料和技术都源于本土，是对第二章所展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的直接经济转化。它证明了，本土的生态与文化，并非发展的障碍或仅供观赏的“展品”，而是实现自主发展的、最宝贵的“生产资料”。

其次是社区主权。卡玛古与道尔顿的商人逻辑——“分一杯羹”——形成了根本对立。卡玛古的回答则是一种共同体宣言：“我谈论的是自力更生，即人们为自己做事……这个项目将由村民自己完全拥有”（Mda, 2002, p.231）。这里的关键词是“为自己”（for themselves）和“自己拥有”（owned by themselves），它标志着发展的主体从外部资本转向了社区自身，这是摆脱“依附心态”的第一步。

最后是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体现在卡玛古对道尔顿“文化村”方案的坚决抵制中。卡玛古拒绝将文化“博物馆化”，他相信科萨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动态生命力：“科萨人不是博物馆展品。像所有文化一样，他们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Mda, 2002, p.231）。这种自信，使他敢于提出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建立一个服务于“热爱自然的游客”的背包客旅馆，提供“非洲家庭生活的体验”（Mda, 2002, p.223）。这种模式的底气，正是来源于第二章所重构的那个充满主体性的世界观：他坚信，科洛拉真实的、未被包装的自然与文化本身，就足以构成强大的吸引力，无需借助外部的、商业化的奇观来确认自身价值。

（三）从虚构到现实：作为作者实践的养蜂合作社

《红色之心》中对自力更生模式的构想，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乌托邦。它在作者穆达本人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从而赋予了这部小说超越文本的实践意义。穆达在其自传《虚空有时》

(Sometimes there is a Void) 中, 详细记述了他在自己的祖籍村庄 Qoboshane 创办“泰勒蜂蜜”(Telle Honey) 养蜂合作社的经历。这一现实中的项目, 几乎是小说中卡玛古方案的现实复刻。穆达创办合作社的初衷, 源于一个与卡玛古相似的信念。当他看到家乡山脉上盛开的芦荟时, 他对自己说: “那座山不能白白地美丽。它必须产出一些能赋予人们生命的东西”(Mda, 2011, p.414)。这个想法, 正是《红色之心》中生态世界观的核心: 自然之美不仅是审美的, 更是能够滋养社区生命的生产力。穆达的实践过程, 与卡玛古的构想如出一辙。他建立了一个“由其成员拥有和运营的合作社”, 而非个人企业。他拒绝了将山脉用于个人利益, 而是为了“社区的利益”(Mda, 2011, p.415)。最终, “泰勒蜂蜜”的成功, 恰恰源于其独特的本土生态——“迪亚霍姆山未经污染的空气以及生长在那座山上的本土草药、灌木和芦荟”(Mda, 2011, p.417)。

穆达最后总结道: “我的写作和我的社区行动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Mda, 2011, p.417)。这一自述表明, 《红色之心》不仅是一次对殖民叙事的文学重构, 更是一份旨在疗愈“依附心态”、推动现实变革的行动“蓝图”。作者的文学构想与社会实践由此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 共同阐释并验证了一条根植于本土生态智慧的去殖民化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与其可行性。

结语

本文的论证始于对康拉德殖民生态话语的剖析。《黑暗之心》中那个沉默、野蛮、非理性的非洲自然, 为殖民主义的掠夺式经济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石。与之相对, 穆达在《红色之心》中的叙事则是一场主体性重构的实践。通过对河流、树木、动物等自然意象主体性的重构, 他建立了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本土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变革, 直接导向了本文第三章的核心——两种发展哲学的对垒。小说中的“赌场计划”与“文化村”方案, 是“依附理论”的文学再现, 其内核是延续殖民逻辑的资本与文化依附。而卡玛古所探索的合作社与生态旅游模式, 则是“自力更生”理念的生态实践, 其根基正是尊重自然与文化主权的本土世界观。

当然, 穆达在小说中给出的方案或许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其模式在面对全球化资本的巨大冲击时是否具备普遍的可行性, 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穆达的方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但这并未削弱《红色之心》作为社会变革蓝图的深刻批判价值与前瞻性意义。穆达以其文学与人生的“共生关系”, 提供了一个思考后殖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 真正的去殖民化, 绝非单一维度的政治或经济议题, 它必须是一场始于文化深处、重塑人与土地关系、并最终体现为社区自主经济实践的系统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 重返《红色之心》, 倾听土地的言说, 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困境, 依然具有深刻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ou Tao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7030-3603>

Xiong Hongy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8084-0638>

References

- Achebe, Chinua (1977). "An Image of Africa."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7(4): 782-794.
- Darras, Jacques (1982). *Joseph Conrad and the West: Signs of Empire*. Macmillan.
- Huggan, G., & Tiffin, H. (2010).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Routledge.
- Mda, Z. (2002). *The Heart of Rednes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da, Z. (2011). *Sometimes there is a Void: Memoirs of an Outsid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段燕、王爱菊 (2017): "贾克斯·穆达《赤红之心》的帝国反写与绿色批评",《当代外国文学》(03): 96-103。
- [Duan Yan, & Wang Aiju (2017). "Empire Rewriting and Green Criticism in Zakes Mda's The Heart of Rednes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3): 96-103.]
- 康拉德, 约瑟夫 (2021): 《黑暗的心 吉姆爷》, 黄雨石、熊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Conrad, Joseph (2021). *Heart of Darkness and Lord Jim*, trans. Huang Yushi, & Xiong Le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乔修峰 (2004) 《〈黑暗的心〉中的幽闭空间与风景的“再发现”》,《外国文学研究》(01): 106-115。
- [Qiao, Xiufeng (2024). "Claustrophobic Space and the Rediscovery of Landscape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106-15.]
- 钟燕 (2014): "卡玛古的选择——《赤红的心》生态批评解读",《外国文学研究》(03): 140-147。
- [Zhong Yan (2014). "Choices of Camagu: 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The Heart of Rednes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3):140.]
- Zannat, Mahfuza & Zhang, Longhai (2021). "A Study on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03): 497-508.